雪爪留痕

谈故宫藏吴昌硕羁留北京期间的五件印作

王幼敏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馆员，主要从事明清流派印研究

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隔年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此时，不少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纷纷离开北京南下，移居上海。这一年的五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迎来了其人生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影响到他对清朝难以释怀的情感。他仍然以遗老的身份自居，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始终被他盘在头上，直至去世……

故宫博物院藏署款吴昌硕的篆刻作品有七十余件，其中既有托名伪刻，也有临摹仿刻，当然也不乏吴氏精心用意的真品。因此，鉴别真伪无疑是首要工作。而对于那些没有疑问的作品来说，则可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如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以及创作背景等，本文拟介绍的五方印作即属这一类。

五印分别为二人所刻。其中，前三印为肃亲王善耆所刻，后二印为陈宝琛所刻。据「偶遂亭主」印、「肃亲王」印印款，可以确定善耆三印刻于北京，时间是宣统二年（庚戌）八月。陈宝琛二印虽未注明刻制时间、地点，但从印款内容可以考知，应与前三印为同时所刻。

关于吴昌硕宣统二年的北京之行，以往的研究已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如吴晶著《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

> 吴氏一行八月到达北京。抵京后，下榻湖州南浔友人张弁群寓所。此次重游京城，吴昌硕遍游名胜古迹。交游广阔的诸宗元则带他参与饮宴，宾客满座，纵谈国事、艺事。……在北京停留数月时间。……次年才返回。

书中没有提到吴氏印学方面的活动，故宫博物院藏印恰好弥补了这点不足。受印人善耆、陈宝琛都是当时政坛上的显赫人物，吴昌硕为他们刻印，当然不是为了与二人切磋技艺，其真实意图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些印作无疑为吴昌硕传记的撰写增添了一些鲜活的成分，也为我们了解其晚年的篆刻艺术风格及政治取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吴昌硕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方度过的。其间，为了生计和仕途，他也曾多次北上，虽然每次逗留的时间不长，但都是其人生的重要节点，与之相伴的还有他的篆刻作品。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吴昌硕三十九岁，由友人集资为他捐了个县尉的差事。光绪九年二月，「奉檄进京放验」，由主事大臣面试谈



清　吴昌硕刻“肃亲王”印
印面长二・三厘米　宽二・二厘米　通高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俊卿刻于宣武城南。”



清　吴昌硕刻“偶遂亭主”印
印面二・六厘米见方　通高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偶遂亭主印，庚戌八月，吴俊卿。”

吐仪态，正式任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酸寒尉」生涯。这是吴昌硕第一次北上，「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印就刻于「析津」。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五十一岁的吴昌硕在吴大澂幕中，来到北京。二月，他以自己的诗、印谱投赠帝师翁同龢，翁氏在日记中评价「似不俗」。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吴大澂请缨出榆关（山海关）对日作战，吴昌硕以幕僚身份「赞化军事」随其出征，后因继母杨氏病危而离开兵营南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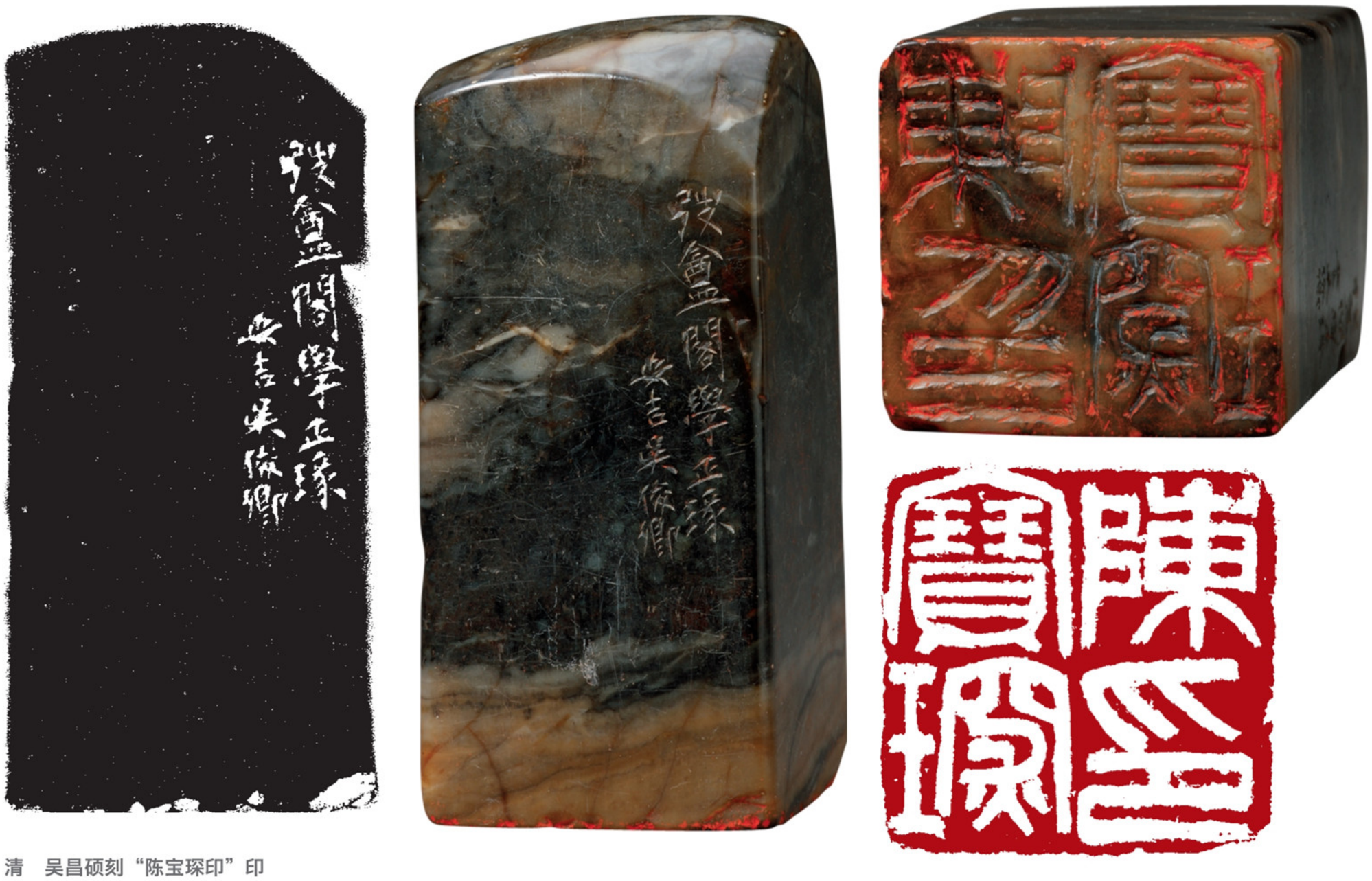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五（一八九九年）年，五十六岁的吴昌硕再次北上。据潘德熙、童衍方编《吴昌硕年表》，五月有天津之行，友人潘祥生刻「吴兴潘氏怡怡堂收藏金石书画之印」。「秋，画《竹石图》题云：『湘灵倒拔青鸾尾，光绪己亥新秋写于析津。』」「析津」，作者按语云：「今北京大兴县。」或有误，应指天津。因为「析津」除北京大兴县外，也是天津的别称之一。吴昌硕书于此年的《致简翁信札》：「别后于十九日乘轮，三日无风浪，廿一日抵析津，住招商局。」显然，吴氏乘轮船到达的「析津」，不可能是北京的大兴县，只能是天津。再有，札中所记述与之相见的师友也都是

当时天津文坛的知名人物，如当时主讲辅仁书院的杨光仪（香吟）、清末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父亲华屏周等。基于上述理由，吴氏两次北上时创作篆刻、画作落款中的「析津」当指天津无疑。

纵观吴氏的这几次北方之行，不难看出多为公事，均与其仕途有关。虽然都伴有诗文、篆刻方面的活动，但他此时人生的主要目标是求仕求官，展示些艺能也无非是想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和赏识，为自己的仕途增加一些筹码而已。



清　吴昌硕刻“如当舍”印
印面长二・七厘米　宽一・六厘米　通高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昌硕制。”



清　吴昌硕刻“陈宝琛印”印
印面长五・一厘米　宽五厘米　通高一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弢盦阁学正琹，安吉吴俊卿。”







清　吴昌硕刻“弢盦”印
印面五厘米见方　通高一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昌硕制。”

对于一个秀才出身的士人来说，这是无奈的选择。

与前几次北方之行相比，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八月的北京之行有所不同。这一年吴昌硕已经六十七岁，仕途这条路可以说已经无望，他此时更多的考虑是如何更充分的展示才艺，为自己的艺术之路打开一片新天地。他下榻友人家中，一住大半年。期间，遍游京城名胜，「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还以自己的诗书画印相投赠为媒介，结识了不少京师的上层人物。从故宫博物院藏五印来看，善耆和陈宝琛应是其中的两位。

说到善耆，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说到他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父亲，知道的人就多了。善耆（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二年），爱新觉罗氏，字艾堂，号偶遂亭主、如当舍主人等，满洲镶白旗人。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称得上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裔，豪格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第一代肃亲王，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称得上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裔，豪格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第一代肃亲王，是清代为数不多的可以世袭罔替的亲王，



善耆像



陈宝琛（右一）与溥仪（中）、朱益藩（左一）

俗称「铁帽子王」。善耆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袭王位，成为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肃亲王。

陈宝琛（一八四八年～一九三五年），字伯潜，号弢庵，福建人，晚清重要大臣，曾两度出任内阁学士，还是宣统皇帝的师傅。吴昌硕为陈宝琛刻的这对名号印，没有注明刻制的时间、地点，但通过对陈宝琛仕宦经历以及吴氏篆刻风格的考察，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陈宝琛印」印款称其为「弢盦（庵）阁学」，「阁学」是对内阁学士的简称。内阁学士是明、清朝官制之一，从二品。明清两代都设内阁，但有区别。明代内阁是掌握实权的机构，内阁首辅的权利相当于宰相。但到了清代，内阁的功能已被削弱很多，虽然名义上仍为最高行政官署，但实权已经转移，实际掌握在军机处手中。

陈宝琛曾两度出任内阁学士。第一次是在光绪朝，据《大清实录》、陈三立《陈宝琛墓志铭》等史料，光绪九年二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宝琛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翌年，「法越构衅，边事正殷，陈宝琛自陈愤懑，愿尽致身之义」。五月，被任命为钦差会办南洋大臣，并授予「专摺奏事」之权。十二月，马尾之战失利，以「尤属调度乖方」，将陈宝琛「著交部严加议处」，遂以「保举非人，贻误军务」降五级调用，于是终德宗世不复出。

陈宝琛二次出任内阁学士是宣统二年，据《陈文忠公奏议》卷下：「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奉旨：陈宝琛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他还做了宣统皇帝的师傅。

从印款所载陈宝琛所任官职，可知二印应刻于北京。巧合的是，在陈宝琛两次出任内阁学士期间，吴昌硕都有北京之行。因此，二印究竟刻于哪一次，还须作进一步考证。光绪九年，也就是陈宝琛第一次出任内阁学士的那年，吴昌硕得到一个县尉的职务，曾「奉檄进京放验」。此时的吴昌硕，虽然在篆刻方面已崭露头角，但以他当时的技艺和身份，恐要藉此结识陈宝琛这样的朝廷大臣，恐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宣统二年的三月，陈宝琛二次出任内阁学士。同年八月，吴昌硕又一次来到京师。此时他六十七岁，篆刻已有相

当的名声，而且已有通过诗、印结交朝臣的经历，曾为吴大澂、翁同和、张之洞等不少朝中重臣刻过印。此时，或陈氏向其求印，或吴氏主动投赠，都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故宫藏吴昌硕为善耆、陈宝琛刻五印，均应刻于宣统二年，地点在北京。印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艺术形式丰富。如「肃亲王」白文印，三字笔画繁简差距大，要想布置得当并非易事。吴昌硕将其整体设计成上紧下松的形式，「肃」字下半部最外面的两划束腰，给笔画少的「王」字让出了更大的空间，使三字繁简协调，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又如，「偶遂亭主」朱文印，更多地吸收了汉印特点，印面饱满。边框仅刻有底边和左边框，底边粗壮，使整个作品沉稳厚重。左边框被「亭」字的最后一笔突破，设计巧妙，独具匠心。将边框与印文作为艺术整体考虑，使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是吴昌硕篆刻的一大创新，「偶遂亭主」印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再如，「如当舍」朱文印，构思上更具特色。「如当舍」三字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取「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三句中的头一字而得。印作借鉴了汉砖的艺术特色，字与字之间刻有栏线，把篆书的圆转与外框的方整结合在一起，形成对立统一。而印文设计成横向，也使得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这样的艺术处理，即使在吴氏作品中，也并不多见。

为陈宝琛刻二印，是一对名号印，一朱一白，尺寸之大，在吴昌硕的篆刻作品中称得上是「鸿篇巨制」。吴氏篆刻深受吴让之影响，刻得都比较浅，这两方大印的印面也是如此。刻的浅容易导致线条深厚不足，但这两方印没有这种毛病。从钤印的效果来看，二印线条饱满，神完气足。运刀圆转，冲、切结合，魄力中显精微，气势里含藉蕴，充分展示了作者把控全局的能力。就艺术性而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文章的结尾，还想谈一谈吴昌硕最后一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对此，有人认为是为弟子陈半丁「把场子」，将其绘画推介到北京画坛。是否如此，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从吴氏本人的记述及其在京的艺术活动中，并未见这方面明确的记载。再有，吴氏在绘画方面得名较他的篆刻、书法要晚得多，来北京之前主要居住在苏州。虽然为生活所迫，也有在上海交游、卖画的经历，但都不是很成功，并未真正打开局面。其在绘画方面真正享有大名，是在六十九岁定居上海之后。因此，他此次北京之行，最主要的目的可能是更多的推介自己。如有可能，甚至不排除有定居京师的打算。然而，时局的变化，不仅使他始料未及，也使他与北京的关系从此画上了句号。

一九一二年即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一九一二年二月，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此时，不少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纷纷离开北京南下，移居上海。这一年的五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迎来了其人生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影响到他对清朝难以释怀的情感。他仍然以遗老的身份自居，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始终被他盘在头上，直至去世。